

## 肖向前<sup>①</sup>

地点：北京红星胡同

时间：1995年2月18日



钟：很高兴您能给年轻人讲讲您当年留日的情况。

肖：我的家乡是东北，辽宁省台安县，在沈阳附近。县里很穷，过去是闹土匪的地方。说别人你不知道，张学良就生在我们县。我上小学时候，受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影响。在我的家乡，日俄在我们中国打仗，欺压我们中国人。土匪也是他们的工具，被日俄各自支持一帮。张作霖原是日本支持的一帮土匪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，日本侵占东北，我已经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了。当时我县的中学已经有共产党支部，老师有共产党员。我班的老师张

<sup>①</sup>肖向前，1918年生，辽宁人。1938年赴日本留学。1942年底回国，从事共产党的工作。1949年后，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、驻外大使等职，为中日友协副会长。

希平原是东北大学的，后来才知道是避风到我们学校的，当我们班的老师，半年就走了，不久就被捕了。我参加的活动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。我还有一个老师是朝鲜人，他搞讲演会，鼓吹抗日联韩。到“九一八”以后，他们全走了。

以后就是日本统治另一套了。我在本县初中中途退学，到沈阳念高中，进奉天师范学校，就是张学良时代办的同泽中学校址。教师一部分是前东北大学的，我学了三年，要毕业了，我就考公费留日学生，考上就去了。

我得到一份留日学生考取证明书，可以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。1938年初，我去到沈阳国际观光局买了一张联票，可以从沈阳上火车，到大连再上船，然后经过门司到神户登陆，一张联票就通行，直达东京。春节过后不久，我先到沈阳一同学家，当天夜里上火车，坐硬座，到鞍山附近，上来一个工人，是上早班去的。他问我干啥去？我说我上日本留学去。他说：“你好好学，将来报效祖国。”我听懂他的意思不是满洲国。

到大连上的船名叫“扶桑丸”，载重7000多吨的船。统舱很大，男男女女一大堆。特高警察来查问，问我怎么来的？我就给他看留日学生证明书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不到当地警察署去？”我说：“去干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有当地警察署证明就更好了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呀。”他也就算了。

从大连上船，我是头一次看到大海，很新鲜，船到了日本门司港，在家乡还是冬景肃杀时，这里却山青水秀，我想日本真挺漂亮。在路上，碰到几个从营口到日本学习百货公司的中国人，他们探亲回来。一路上大家熟了，他们挺照顾我。当时我的日语还不行。他们在神户上岸，我也跟着上岸，他们是到阪神百货公司去实习的，我也跟着去看看。当时日本的交通已经很发达，我们今天要赶上那时的日本交通标准，恐怕还要费

一番工夫。他们带我逛了阪神百货公司，还招待我吃了顿饭，送我上了火车。走前我打了电报给东京庆应大学的同学，第二天早上车到东京车站，老同学方允中已经在等我。他当年有30岁，我才20岁。他把我接到他家，他已经有家庭，他的夫人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。他父亲曾是我们县的县长，过去是东北军的团长。他思想进步，读过《资本论》。

然后我们就去找房子，马上就找到了，在多摩川附近，东京工业大学旁边。房间有6席大，我随后就住进去。房东是一位老头，一位老太太，他们照顾几个学生，管一顿早饭。我的生活用语就是跟房东学的。从2月到达，4月开学，我说一般的日本话就可以了。我没有上补校，直接就考上东京高师特设预科一年，这学校是明治时期嘉纳治五郎先生办的。管我们的老师叫森本常藏。

当时伪满学生会馆盖起来了，要我们都住进去，没有办法，就去住了一年。会馆在饭田桥，不远处就是神田街书市，其中内山书店有许多国内来的进步书籍，我就经常跑去买书。到其他旧书店也可以偷偷买到进步书。别人告诉我，有特工监视书店，开始我也不在乎，还是去站在店内看书。去熟了，店主内山嘉吉的夫人有时看我看书时间太长了，也倒一杯茶给我喝。他们还代找书，我买到了书看后就藏起来。这期间我受的影响，主要是庆应大学的同学方允中给我的。当时东京高师是国民党地下活动中心，共产党还没有打进去。

第一年过去了，第二年我就进宿舍住，同日本学生一起，日本语就用得比较熟练了。预科以后我就从理科改学体育，不是为了出成绩打破记录，我以前爱打篮球和跑步，打球呢我个头不够，跑呢我速度不够。我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准备参加革命。

钟：日本体育学科如何？



浅草寺的手相屋（1936年）

肖：东京高师的体育科分三个单元：甲是现代体育；乙是剑道；丙是柔道。我学甲，即我们现在搞的一套。日本当时体育不错，同校的老同学吉岗龙德是奥林匹克（在洛杉矶）百米的第六名；1936年德国奥林匹克，田岛直人三级跳到16米，获得金牌；远东运动会更是他们的天下。1936年，马拉松金牌得主是朝鲜人，万米跑日本得第三，游泳也不错，女蛙泳得第一。在日本高校联赛中，一个田径、一个篮球，东京高校在日本高校中是名列前茅的。

我在学习体育时，书包中放上马列主义的书，晚上到图书馆看，特务不到那里去，同学也不管，我一直学到毕业。1938到1939年，我是自己活动。1940年参加读书会。到1941年，地

下组织新知识研究会就明确我是成员之一了，虽然不是共产党员，但已经要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了。这些活动当时全不公开。

我在东京高等师范体育科毕业后，又进了文理科大学。我考的是心理学。当时已经准备回国做地下工作。此前，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了，日本人庆祝偷袭成功，我们则分析日本完了。日本他同美国打一仗，他就完了，他肯定失败。日本有识之士也知道要完了。我们就准备胜利，收复东北，所以我在1942年底就回国了。我回到沈阳，经过准备，以做银行员来掩护，开展地下活动。

钟：您在日本生活中还有什么回忆？

肖：我的同学是干体育的，讲“块”的，头脑不太发达，但人也不笨。当时日本高校有两大学阀系统：东京大学“红门”出来当官；东京高师“大塚门”出来当老师、校长，是学阀。日本很注重教育，高师就是秀才集中所在。我记得有一件事：有一次校内大扫除，我存的书就放在睡铺上面的隔子里，大家一块搞卫生，一位同学一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，他说了一句：“你怎么看这样难懂的书啊”。但他没有报告，也就没事了。

在宿舍住了两年，我要搬到宿舍外边去住，当时晚上常到小店喝咖啡，我就请店主老太太替我找房子，老太太答应帮忙。第一次找到的房东是一位落魄的大学生，好向房客借钱，也向我借钱。老太太说这人不好，就再帮我另找一家。是西巢鸭一家卖菜人家，房子较大，楼下卖菜，楼上8席，我就住进去，从1941年直到回国。我受到很好的照顾。日本风俗上要随着主人，经常送点小礼。我每天按时出去跑步，生活很规律。房东也高兴，讲我的好话，四周邻居也好。我每天一早6点起床，到马路上做操。7点吃早饭。一个月只要18元食宿费，我一个月用

60元钱，是中等生活水准。白天上课上图书馆看书，晚上回来，在附近小餐馆吃饭。我们读书会的活动，是安排看一本书，例如河上肇的《经济学大纲》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书，中日文都有，到时聚会交谈体会。有时在我的住处，有时到多摩川大堤上，散步似的边走边谈。或者去野餐，边吃边谈。

我还登过一次富士山，赶上台风，没有到顶。我们在晚上上山，拿着灯笼，登到顶叫“一升”，走到“八合半”，来台风了，赶紧下来，就从另一面，蹭着火山灰往下滑。在日本，人们这样说：登一次富士山是不能不登；登两次是“八格（傻瓜）”；登三次是“噢八格（大傻瓜）”。作为体育课我也去滑雪、游泳、滑冰。集体生活，很有趣味。每到假日，我看电影挺多，特别有一些西方名作，雨果、莎士比亚的，有时一个星期天连看几场。

1939年到1942年，我每年暑假回国一次。从国内情况看，我家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土改时定为经营地主。当时我从日本回家，一路上感觉差别极大：在东京随便吃大米饭、吃鱼。回到家，吃大米是违法的，成了经济犯了。只有吃高粱米饭，而吃鱼、肉是很贵的。在东北生活很苦，中国老百姓做亡国奴，挨打受气，吃不饱是常事。东北的一等公民是日本人，二等公民是朝鲜人。东北还有一部分是关东州人，即住在旅顺、大连一带的。这是日俄战后，日本取得南满铁路经营权以后划出来，由日本直接派长官来，算是日本国土。生在这里的日本人也有的很有感情，像大来佐武郎等人。

钟：您做对日工作几十年，有什么体会？

肖：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一直做对日工作。我们跟日本，一言难尽。大平首相说：地理上的邻居没法选择。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长期的交往，恩恩怨怨也不少。

钟：竹内实教授提出一个看法，他说中日之间讲友好容易，理解难。您怎么看？

肖：中日之间有恩怨情绪，这是难以简单摘开的。我做对日工作，原则上应该讲友好。话虽好说，具体友好难做，跟日本人很难交成朋友。但是做分析的话，日本有几个可贵之处，首先是这个民族形成中，为什么这么认真。向来如此，可谓日本民族性。你骂他“臭认真”也好，他也还是认真。日本能够有今天，认真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个优点也就带来一系列问题，即我这样认真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认真？他们对别人责备也就较大。这同朝鲜人比就很不一样，这两个民族各有可贵的优点，干劲都很足，但朝鲜人善变，日本人则轻易不变。朝鲜人一下子就干起来，看看不妥就改变了。而中国人则博大，大到宽大无边，而精深则不突出。日本人倒是精深，紧追得厉害。朝鲜人则有突击精神。现在我研究，鸦片战争以来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，中国受西方欺负了，也向西方学到东西了，这一点必需承认。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用了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”长期以来，东方为主，后来西方为主，现在吸收了西方，东方又要为主了。正反合，东方要拿出个像样的东西来，新加坡有人讲了，这就是儒学体系，我们没敢讲，是不是就如此？值得深入研究。

钟：就是在这个前提上面，我是持悲观态度。我对这个“儒学体系”有看法。我也观察到日本的儒学，跟我们根本是两码事。

肖：不一定叫什么名称。他们容易简单归结成叫什么。我们从“五四”以来批孔，批他是有原因的，不能说批他全错了。你把儒学全面拿过来，那不对，按孔老二那个“忠”，那个“孝”，谁受得了！但是，长期以来形成民族特点，有优点也有

缺点。你能把优点凑到一起，将来就在东亚起好影响，将来在世界起好影响。我觉得，日本在近代化问题上，功不可没。我们中国没有走在前面，近代化在东方带头的是日本。当然日本有各种各样问题，跟我们有种种恩怨，但他在近代化方面走在前面。走在前面就有经验，有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经验，可以学习研究，取长补短，为我所用。

往后怎么发展？我看日本也不要把自己估计太高，现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，是他的市场太小，资源太缺。一讲到将来，一个市场，一个资源，看来是决定一切的因素。你要制造什么？决定于谁买你的，谁用你的东西。如果没有人买，你的制造根本不可能。因此，人的资源，物的资源，跟中国比，至少在量上日本都比不上。中华民族一旦觉悟的话，不比谁笨。前一段时间，日本走在前面，把中国看做劣等民族，认为中国怎么也赶不上他。一直到最近也还有这种观点，这不行，这是他的狭隘。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你小日本啥也不行，今后是我们的天下，这也不对！今后相当一个时期，日本还是领先的。从长远说也是各有优点，互为领先好。

钟：还有第三方面，日本在文化上提出要求太低，缺乏做文化大国的思想准备。

肖：全面讲到文化社会，哪个模式也不能固定用。日本人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看不清楚自己，这跟它作为岛国有关系。仅仅看到自己，看的只有自己，这也不行。从全球人类来看，如果自己位置摆不正，那就要吃亏。例如，生鱼片我可以吃，但如果规定就你那个好吃，这可不能一定！生鱼片我倒是爱吃，但你这个食品，是跟军国主义侵略一起来的，我一见生鱼片就烦了。人是有感情的，道理就这样简单，日本人对过去的侵略罪恶缺乏反省的话，就不能得到曾被侵略的周边国家的信任，因



而就没有办法共同发展，自己也就不可能发展。当然，日本有日本的反省，我们有我们的反省。现在有两个方面，我的看法有点接近你说的悲观，一是大而无当的东西太多了，真正脚踏实地做点事的人太少了，包括我自己。

钟：一些人从人文科学讲一讲，也不影响大局。现在经济上搞泡沫，仅靠倒来倒去，国家就会发展，我是不相信的。

肖：一个国家的优势，若是用过了头，也会产生反面作用。日本人是非常精于算计的，看到战后英美产业衰退的情况，非常害怕患上英国病、美国病，走向产业空洞化。其结果是在竞争中追求最高利润，逐渐投机性强，自己搞成了泡沫经济，致使房地产涨到世界最高，一度自称，一个东京都卖掉可以买两个美国。工资大大提高，日元大幅升值，许多制造业再难在日本本土生产。特别为平复长期大量的外贸出超，把日本的工厂设在海外，进口自己制造的商品或合资合作经营的产品，成为当前非走不可的出路。人人都说现在日本也要空洞化了。

日本人技术转让最不积极，生怕别人强大了跟自己竞争或不买日本的东西。比如汽车，20年前我们说：一起合作吧。日本人就是不干，而且讲了很多歪道理，说什么中国人还不具备大量生产轿车的能力。他就是要卖日本的车。现在美国、德国都来了，特别是大众汽车公司跟中国一合作，竞争力特强，甚至要把共同生产的高级车卖到日本去。日本人这才明白，但已经晚了一步。

日本人长于拿来主义，学别人的东西很快。但从基本理论到发明自己的东西，就不那么简单，现在日本人已经到了没有多少现成好学的机会了，要想动科学技术的真格的本领就更不简单。日本人老说有危机感，现在叫得更凶，说明他们正在寻找新的出路。我们则很缺乏这种危机感，应当改变！

日本过去侵略别人，学了西方坏的一套，现在不反省不成。今年是战胜法西斯 50 周年纪念，日本不认错过不了关。按现在日本的表现连意大利都不如，比起德国相差甚远。要取得世界各国的信任，首先要争取周边国家的信任，向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加害的邻国认错是最重要的。在这里必须申明日本普通老百姓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，所有的受害者应该站在一起，促使这种反省做得彻底，防止战争侵略灾难的再来！如果日本只想闭守在四个岛上，那是另外问题；但现在日本想的是成为政治大国、经济大国，要求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崇高地位，在世界市场上推销日货，倘连起码的承认错误的觉悟都没有，还有什么资格指望别人信任你呢？人家不相信，谁还同你打交道、交朋友呢？